

谢希德先生出生在1921年，这是一个庄严的年份。一转眼，她的百岁生日纪念日到来了。

在复旦，只要一提起这位老校长，人们就会交口称赞，即便是最挑剔的“意见领袖”，也会对她心悦诚服。肃然起敬。她是一位离世多年后仍被师生经常念叨、发自内心爱戴的人——要达到这一境界，很难，但谢先生达到了。我常想，谢先生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

我与谢先生没多少交集。1978年我考进复旦时，校长是苏步青先生，谢先生只是几位副校长之一。那次开学典礼，苏步青校长讲话，夏征农书记主持。主席台上，坐着一排校领导，除了苏老、夏老外，其他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想不起来谢先生是否也坐在台上（如果在的话，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我对此已毫无印象。她真正在我脑海里留痕，是我毕业留校任教以后。那时，谢先生六十开外，头发已然灰白，一脸慈祥，常在校园里蹒跚行走。依稀记得，她好像永远系一条真丝围巾，鲜亮、高雅，显得与众不同。我没见过她年轻时模样，据说不少老复旦子弟见过——上世纪50年代，她常去国权路来喜饭店用餐，“那时，她是穿西装裙的！”

与谢先生见面，有如沐春风之感。我们教研室在新办公楼（位于第一教学楼南面，今已拆）二楼西侧，说是“新办公楼”，设施却很简陋，没有电梯。有一次，我正好下楼，在楼

文人三「让」

宋仲璋 “融四岁，能让梨”，这是《三字经》里的话。《三字经》成于宋，“宋儒王伯厚（应麟）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是传统启蒙读物中的经典。能够录入该书的事例，基本就是典范，譬如“孟母三迁”“窦燕山教子”，再如，孔融让梨。

孔融，孔夫子的第二十代孙。他四岁时的某一天，有人送来一篮梨，父亲对他说，吃梨吧。孔融从一堆梨中挑了一个最小的，父亲见了，惊讶地问他：“你怎么挑个最小的呀？”孔融说：“爹，我年纪最小，吃小的，把大的留给哥哥。”（弟子长，宜先知）

这么小，就这么乖巧、这么懂事，名副其实就是当今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小孩”。因此，入了《三字经》，成为千古传诵之道的道德楷模。这是主动谦让的，也有被动让的，让的还是浑然不知的，而且，让的不是梨子这么小的东西，而是状元之位。列位看官不禁要问：谁啊，这么傻啊，把状元之位拱手让给别人？问题就在这，他——不，是他俩（因为不止一个这样“让”了出去）不是自愿的。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先说宋祁（虽然当事人都是宋人，但宋祁比苏轼大39岁），大哥先上。宋祁是词人、史学家、高官，诗词语言奇伟工丽，因其词作《玉楼春》中有“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句，获誉“红杏尚书”。今人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称“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盛赞宋祁遣词造句的卓越功力。

“让”状元的事，就发生在这位“红杏尚书”身上。1024年，宋祁与其兄宋庠同榜中进士，礼部本拟定宋祁第一，宋庠第三，但章献皇后认为弟弟不能排在哥哥的前面。因此，定宋庠为头名状元，而把宋祁放在第十名。兄弟同榜高中，人称“二宋”，以大小区别，所以又有“双状元”之称。

这个高太后也太那啥了，凭什么弟弟就不能比哥哥学问大、比哥哥优秀？远的譬如孔丘、孔仲尼，他哥哥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谁知道！近的譬如“拗相公”王安石，官至宰相，名列“唐宋八大家”，他大哥叫什么？二哥叫什么？干什么的？你知道？他兄长虽然也是进士，但比王安石晚了7年，难不成等兄长王安仁考中进士后王安石再考？何其荒唐也哉！

的甯晞涛，后宫干政，滥用权力一至于此。这是因为年龄让的，还有因为师生关系让的，这个事主就是大文豪苏轼。1057年，苏洵带苏轼、苏辙晋京应考，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考官梅尧臣的赏识，梅推荐给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亦十分赞赏，欲拔擢为第一，但又担心该文为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点为第二。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该文为苏轼所作。你瞧，大文豪欧阳修虽然不像章献皇后那么专权霸道，但跟章献皇后一样主观武断。举贤不避亲，遑论学生乎？欧阳大人。还好，是金子总会发光。到了礼部复试时，苏轼作《春秋对义》，再以文章实力说话，雄踞第一。这一次，谁也褫夺不了啦。

梯拐角迎面遇见谢先生。她腿脚不便，正抓着扶手，吃力地向上挪步。“谢先生！”我招呼道。“你好呀！你在哪个部门上班呢？”谢先生笑容满面，像个久违的老朋友——这是我与她唯一一次对话。谢先生去世后，我读过几位学生回忆，说当年出国留学，他们都喜欢找谢先生写推荐信。她虽然很忙，但从拒绝，总是

谢希德先生的魅力

张国伟

在夜晚亲自打字写信……我就瞎猜，新办公楼二楼东侧是留学生办公室，谢先生那次上楼，会不会与推荐学生留学有关呢？

谢先生讲话，条理清晰，从不拖泥带水。我第一次听谢先生演讲，大概是在1983年她刚任校长不久。开会地点在大礼堂（后改名为“相辉堂”），由谢先生谈学校规划——在我看来，应该就是她的“施政纲领”。没想到，谢先生一开口，就把听众镇住了：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抑扬顿挫，不紧不慢……要知道，她的前任苏步青、陈望道校长，讲话都带浙江口音，李登辉校长则是一口流利英语。谢先生幼年在北平上学，她的“标普”，真让人有清新脱俗之感。更令人意外的是，“施政纲领”只讲了四十分钟，她就说：“今天就讲到这里，散会！”什么？会议结束了？我与另一位青年教师面面相觑，连连叫好：“谢校长不啰嗦，言简意赅，干脆！”

王文娟的爱心

专门给在养老机构生活的老人们送温暖、送欢乐的上海“笑口常开艺术团”成立之初，经费极少。为此，艺术总监、越剧表演艺术家孟莉莉来到老师王文娟家中，请她想想办法帮忙解决困难。

听了亲如姐妹的学生孟莉莉的叙述，王文娟说：“老人们渴望文化生活，这种感受我是知道的。阿孟，你还记得吗？有一年我们一起去浙江嵊县做‘回娘家探亲演出’，临走时好多老人围着我们，拉着我们的手，哭着让我们不要走，多为他们唱几场戏。我俩当时也都是眼泪汪汪啊！现在艺术团有困难，这个忙是肯定要帮的。”经王文娟的奔走，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伸出了援助之手。

在王文娟的带领下，

往“云”上倒照片，一面看一面清理，发现了好几桩得意的事体，可以归并在这里：在春季打折的尾巴买了件线衫，试的时候就里面一叠厚厚的衬纸拿好了，买单的时候看到小姐姐又要用同样厚的一叠纸来包，我拗骚喊停，直接拿走衣服，用原来那叠纸裹了一下塞在自己的衣兜里。现在在实体店购物，我一般都不再要伊拉的购物袋了（年轻时的时候一度很喜欢要，而现在，只有特别特别大的牌子可以例外，这点虚荣心请允许我保留）。

吴江路口的日本咖啡店因为装修而小别，两月廿七号最后一天。老喜欢那家的同事物骚买了蛋糕来投喂别人，最终阴阳差便宜了我。那个装起司蛋糕的纸盒封口很妙，像正反两个B对冲，稍微一扭就卡好了。忽然又有同事送来不晓得什么人给他的油条（好像是安安徽寄来的，上海的食品店已不多见这是从暴露年龄的小吃——“食品店”这概念甚至也不多了），我欢天喜地接下来，没吃完要放冰箱，正好轻松愉快地把那个妙纸盒又派上了用场。

和那个起司蛋糕同时来的还有一个纸袋封好的叉子。我的蛋糕是直接下嘴啃的，叉子就被和其他那些点外卖时坚决不要却又被坚

谢先生一向低调、随和，但她的气场却很大。朱镕基市长当年到相辉堂作报告，开场白就很幽默：“因为谢校长请我，我再忙也要来……”顿时，全场欢笑，掌声四起。1984年4月30日，美国总统里根访问复旦，谢先生作为东道主，热情迎接。我那天没在现场，后来来看录像发现：里根总统四周，都是身材高大的保镖，虎视眈眈，如临大敌。与这些老外相比，谢先生显得矮小，走路步子也不快，但她一举手一投足，彬彬有礼、温婉得体，人气一点也不输给电影明星出身的美国总统。1985年初，我有好几次搭校车去市区，经常在车厢里见到谢先生。我后来在《相辉》一书中描述：“她腿脚不方便，总是坐在靠前的座位上；每次上下车，她都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车厢里，教师们谈笑风生，她笑眯眯地倾听着，偶尔插上两句话……”其实，还有一个细节，也值得一提——有一天，下班发车前，校办秘书跑来向司机“请假”：“今天谢校长晚上有会议，不乘校车了。”这时，有人轻声议论：“唉，谢校长今天不来乘车，没劲！”这种崇敬、怅然之感，与那些领导一来就噤若寒蝉的场景相比，简直判若云泥。

“大音希声”，“上德若谷”，谢先生的魅力，早已融入到新时期复旦精神中，春风化雨，汨汨流淌。前几天整理书房，忽然找到我的第一张教师聘书，上面钤印着谢先生名章，于是就自豪地想：在复旦，我曾经与谢先生共过时空，何其幸矣。

一个父亲追寻孩子之路

塞尔维亚影片《一个父亲的寻子之路》开场有一个惊人的画面：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讨要工厂拖欠丈夫的工资，然后用汽油浇淋全身点火自焚，幸亏扑灭及时，活了下来。但对她丈夫尼古拉而言，不幸才刚刚开始。

尼古拉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小人物，两年前下岗，没有拿到工厂承诺的剩余工资和遣散费，只做着在树林砍树之类的临时工，贫穷和饥饿，让妻子做出了过激的举动。更让他想不到的是，福利中心要对他的家庭评估，看看他是否具备继续抚养一儿一女的条件。

福利中心主任假借假借，认为尼古拉住房条件很差，在评估前，可以先去改善，比如粉刷墙壁，通上电，接上水管等等。尼古拉只得借用邻居的电表点亮电灯，设法安装水龙头通水。事实上，中心根本就不会通过评估，理由是：尼古拉的临时工身份很难让福利中心相信他能在经济上为孩子们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两个小孩最后被判定无限期交由寄养家庭抚养。

在貌似为孩子着想的背后，影片通过福利中心保安之口，告诉尼古拉内幕：主任把所有孩子都送到他村子里亲戚朋友家，国家会给每个孩子补贴4万元，那儿有30多个孩子，他从每个孩子身上拿30%的钱。假如你要起诉他，他法院里有熟人。尼古拉曾绝食表达抗议，但主任口气严厉：“我们会叫警察，说你态度恶劣，妨碍我们工作。我们也可对你评估，说你不可理喻，和你老婆一样具有自杀倾向。这是法律给我的权力，这里归我管，而不归你管。”

电影以一种揭露的方式，让腐败官员假借法律的名义，无法无天，盛气凌人，小人物似乎毫无办法，但尼古拉是个例外。导演戈卢博维奇用平缓的节奏，讲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尼古拉决定去首都贝尔格莱德申诉，他没有钱买车票，居然步行300公里，从他居住的格勒布——普里波耶附近的小村庄出发，翻过阿瓦拉山，走了5天，到达目的地，显示了一个父亲为夺回孩子坚

决送来的餐具放在一起备用——我发现好些同事的桌上都有这么一堆。窃以为最好的解决出路还是随身携带，特别适用于一家日料快餐——拿了鳗鱼饭和收银小姐说“别的什么也不要”，然后就在旁边吧台一样的地方从包包里掏出自带的勺子站着吃起来。我的体会是：一半又一半勺子的那种最好用。最近常去一个加拿大连锁咖啡店，咖啡

韧不拔的决心。尼古拉随身带一个包上路，里面有一条毯子、一块面包和一瓶水，长镜头跟随他穿过高速公路、古旧的村庄、树林和山坡；俯瞰镜头里，荒野、山峦使他显得渺小；手持摄影镜头中，在道路上摇晃行走更凸显出他的疲惫；夜晚，昏暗的背景，他蜷缩在毯子里，感到无助；早晨，明亮的光线，让他鼓起勇气前行……在没有音乐、只有自然声的背景里，影片来得极其真实。

公路片的特性，使得尼古拉一路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因在高速公路行走，被警察拦下；遇见流浪狗死亡；偷渡客愿意无偿帮他忙；松鼠、野狼出没在丛林；路边晕倒，住进医院，病友告诫“为别人付出不值得”；遭遇小偷；便利店借宿……片段式的场景，既是尼古拉自身旅程丰富多样的展现，又是塞尔维亚社会风貌、人情世态的表现。

很难不被尼古拉扮演者戈兰·波格丹所折服，他因本片获第33届欧洲电影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尼古拉沉默寡言，感情不外露，但埋葬流浪狗的场景，凸显他的柔情；当他到达贝尔格莱德，好心人送给他食物时，他激动得哽咽——所有委屈尽得宣泄。尼古拉意志坚定、顽强、一根筋，徒步上诉如此，在社会事务部非见部长不可也是如此。在经过几次推诿后，因尼古拉接受电视台采访事件曝光，部长助理答应见面，并写了一封建议归还孩子的信。

这不是一部圆满结局的电影，福利中心主任并没有因为建议信而改变所有的一切，他说：“这封信毫无约束力，这只是政府的建议，哪怕总统写来建议信也没用，还是中心说了算。”随后，导演设定了一连串令人发噱的场景：尼古拉回家，家里空无一物，所有东西都被邻居拿走了，他一家取回别人正在使用的自己物品——电视机、桌子、椅子、碗盘、钟……这可能暗示：想要夺回自己的东西，必须自己亲自动手。对归还孩子这件事，尼古拉绝不会罢手。

家有一个共同心愿，为老人服务，让老人欢乐，大家不考虑个人得失，不管是大伏天还是三九严寒，十多年如一日穿梭在上海各家养老院，为老人放声高歌，亲眼看到老人们笑口常开时，大家都很激动。这就是大家的心愿。”王文娟还亲笔画了一幅《硕果累累》的国画送给“笑口常开艺术团”，画面上在墨绿苍翠的葡萄叶簇拥下，一串串紫红色的葡萄晶莹剔透，甜蜜蜜的味儿似乎透纸溢出。

王文娟用娟秀、工整的小楷写了一封信送到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她在信中满怀深情地写道：“艺术团成员来自四面八方，自愿汇聚在一起，在团长张履贵的带领下，大

马塞洛 之外很爱他家的卷和甜甜圈。办了会员，被送了饮品买二赠一券，就带着某次朋友请喝奶茶留下的空袋袋去了家附近的一间，两杯打包的咖啡塞进去（是的里面用来固定的纸型也在的），另一杯手持，边走边喝起来。这家的店员小哥从此也记得我了。

对了，买咖啡之前在外面看到两个被太阳晒得面色很深的阿姨，一个拖了黑色的垃圾袋在回收饮料瓶，一个骑了黄鱼车，车上是一叠叠被规整好的纸板箱。就想起去年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可能再迟一两个礼拜吧，夜班骑车回来，在江苏路东诸安浜路口吃红

最近的几件事

灯，碰到一个也是骑了一黄鱼车纸板箱的师傅在和另一个开动车的熟人远远地大声打招呼。那时候疫情正猛，大家都惶惑得不行。看到收废品的师傅复工了，忽然就有点儿笃定了。当时还眼明手快拍了照，后来发朋友圈，配文是我很喜欢的名人名言：“只有那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这一腔最得意的手笔，是赶在三月初之前给北京的朋友发快递，寄好不容易托人买来的国际饭店的蝴蝶酥（去大光明看电影的时候试着买过两次，每次都是望着黄河路上的排队队长龙心生畏惧默默走）。有句讲句，我也不晓得伊爱不爱吃，就是觉得北方的点心都不大行，伊又生了一只南方胃口，趁着天还冷，吃食里也只有这东西可以不用冷链、自己随手寄快递。本打包达人谢绝了物流公司的包装服务：用来撑住蝴蝶酥的塑料盒子装过龙眼，外面再套泡泡袋——网购书还是衣服时留下的，当时拆得很小心，就觉得这袋袋说不定啥时候要派上用场。果然。后来得到的反馈，伊和伊拉猫都特别喜欢，哈哈……

水面云山 寻梦 缪贞谊篆刻

遇到有设计感的包装，心生小确幸。

包装这细活 责编：杨晓晖

十日谈

遇到有设计感的包装，心生小确幸。

遇到有设计感的包装，心生小确幸。